



教育学会与中国近代教育 学术研究

| 杨卫明◎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育学会与中国近代教育 学术研究

| 杨卫明◎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教育学会是近代中国教育变革进程中一股不可或缺的驱动力量,折射着“救亡图存”的教育诉求与新式教育发展对于学术研究的急切呼唤。与近代中国其他学科或学术领域的学会类似,教育学会也主要通过召集年会、编辑发行刊物、设置专门机构等近代学会制度应有之举措,搭建起学术研究的平台,联络、汇聚平时散居全国各地的热心教育之士与教育专业人员,进而集成教育家群体之力深入于教育学术研究,不仅为近代中国教育变革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而且彰显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制度化色彩。

本书借鉴近代学会制度以及学术体制的有关理论与分析构架,考察教育学会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情形。在概述教育学会产生与发展基础上,既展示教育学会学术研究的制度依托,又以江苏省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教育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等为个案,具体呈现教育学会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从无到有,从导入、搬运到深化的历史进程中或主持或参与,积极助力,促其嬗递与拓展,丰富教育学科理论与方法,直至催生新的教育分支学科的场景,并剖析教育学会与近代中国政府、大学之间的关系,以瞭望教育学会学术研究的限度与调适,之后,从总体上揭示教育学会对中国近代教育学术以及教育学科发展的贡献与局限。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学会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杨卫明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清华汇智文库)

ISBN 978-7-302-51612-5

I. ①教… II. ①杨… III. ①教育学—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7139号

责任编辑:陆滢晨

封面设计:汉风唐韵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丛怀宇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30mm 印 张:21.75 字 数:323千字

版 次: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79.00元

产品编号:079278-01



聚学术精粹 · 汇天下智慧

中外历史昭示人们：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近现代学术更有赖于建立在大学、研究机构、学会等平台之上的“学术共同体”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也需要凭借学术期刊、图书出版、广电传媒等媒体所发挥的传播、推广之力，古人所说的“藏之深山，传之后世”这类私家秘传学术成果的情况一般来说已不复存在。有鉴于此，美国学者库恩(T. S. Kuhn)把科学史划分为科学内部史(in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和科学外部史(ex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并解释到，科学外部史主要关注科学知识创造的外部条件和体制，力求阐明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在近现代主要表现为政府、大学、学会、科研机构、企业、出版社以及各种组织、团体的影响与作用)。^①国内有的专家强调：“中国学术之发展演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层面的演变；二是制度层面的演变”，并认为所谓“制度层面”在近代中国主要包括学会、大学、学术研究机构、出版机构、图书馆、各类学术评议会及其制度。^②笔者也曾指出：“概而言之，学术史的研究主要有内外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即偏重‘内在理路的研究’和偏重‘外在理路的研究’。前者旨在通过对学术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的考察和分析来揭示学术思想的内在逻辑线索，因而重在学术的观念和理论层面……而后者则侧重于考察和分析学术与社会(主要包括政府、大学、学会、企业以及各种组织和机构等)的互动关系，力求阐明影响和制约学术发展的各种外在社会因素，因而重在学术的实践和制

① T. S. Kuh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D. L. Sills(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4,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 pp. 74-83.

② 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7~17页，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度层面。”^①

摆在读者面前的专著《教育学会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即依据并贯彻了上述研究思路,聚焦于教育学会对中国近代教育学术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这一主题。本书结合中国近代教育学会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状况,主要运用外部史的分析框架,重点探讨了在中国近代教育学术体制化的进程中教育学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本书的主要价值和特色可概括如下。

(1) 把教育学会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学术体制化、制度化的重要环节,对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轨迹以及学会自身的建制、其开展教育学术研究的组织和活动方式等重要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具体而言,本书既结合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新式教育的兴起、学科体制的创立等因素探讨了教育学会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又描述了清末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学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既从总体上揭示了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的数量、类型等基本特征,又结合时代的变迁考察了中国近代教育学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旨及其传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既从教育学会与教育学术研究主体的角度介绍了中国近代教育学会会员的称谓、资格、类型以及入会手续、程序等,又针对中国近代教育学会促进教育学术发展这一中心问题分析了教育学会开展教育学术研究的组织和活动方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中国近代教育学会开展教育学术研究的组织和活动方式做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具体包括举办学术年会、编辑发行专业刊物、设立专门研究机构、组织学术讲演、参与世界教育会议等,内容全面,条理清晰,分析细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组织开展教育学术研究工作与活动的“多面相”。

(2) 按照教育学科建设及其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把中国近代教育学会划分为综合性教育学会和专门性教育学会两大类,深入探讨它们对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学术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这体现了本书的另一主要特色。伴随着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教育学科的创立,教育学各分支学科也逐渐产生并得到发展,从而使中国近代教育学体系不断丰富并日臻完善。与这一

^① 肖朗、项建英:《学术史视野中的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9)。

总体趋势相吻合,中国近代教育学会最初建立的主要是综合性教育学会,后来则在此基础上不断分化产生出专门性教育学会,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发展并促成了繁荣的局面。依据上述基本史实,本书首先以江苏教育总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教育学会等近代中国有代表性的综合性教育学会为个案,指出清末民初江苏教育总会通过借道日本导入、推广和研究“单级教授”,传播了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及其教学思想和方法;“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华教育改进社大力引介杜威、孟禄等美国教育家的理论,有助于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及学术研究由“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转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中国教育学会通过对近代中国教育改造、师资训练、大学教育学系方针及设施等问题的反思和研讨,努力引领教育学界走上创立符合国情的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本土化”道路。继而,本书又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等近代中国有代表性的专门性教育学会为个案,集中考察了这些学会对当时中国亟待解决的教育问题或学科建设问题的研究状况,如“职业指导问题”“社会教育在学制系统中的地位问题”“儿童健康教育问题”等。最后,本书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力求分析归纳出中国近代综合性教育学会和专门性教育学会的基本特征,如作者认为综合性教育学会十分关注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其研究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问题”导向和“跨学科”特征,从而在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层面为当时中国教育学界提供了建设性意见;而专门性教育学会则相对聚焦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其研究反映出“学科化”的基本取向,且较为重视通过开展专业性的实验活动来深化教育学术研究。

(3) 进一步采用外部史的分析框架,探讨中国近代教育学会与外部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教育学会与政府、大学之间既有博弈、又有合作的互动关系,这构成了本书的一大亮点。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教育改革及学术发展步履艰辛,处在这种客观环境中的中国近代教育学会必须处理好自身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与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本书分析道:就教育学会与政府的关系而言,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政府之于教育学会的“规范与制约”、教育学会之于政府的“顺应与抗争”、教育学会与政府之间



的“合作与互动”，并以江苏省教育会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中国教育学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等为例加以具体说明。就教育学会与大学的关系而言，主要也表现为三种形式，即通过“散布”的形式教育学会分别联络大学教育院系开展教育学术研究，通过“聚合”的形式大学借助教育学会传播与推广教育研究成果，通过“合作”的形式实现教育学会与大学学术研究的“双赢”，并以新教育共进社及中华教育改进社与东南大学教育科的关系、中国社会教育社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关系等为例加以具体说明。上述分析和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发前人所未发，颇具新意。

通过以上内容的梳理，本书总结道：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搬运移植到本土建构，在此历史进程中教育学会或主持，或参与，始终引领着教育学术的发展，拓展与深化其研究领域，并逐渐实现学术理念的更新、研究范式的转换、教育学理论与方法的丰富，直至催生新的教育学分支学科；与此同时，教育学会通过妥善处理与政府、大学之间的关系，为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推进营造了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护翼其成长；当然，由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实践理性”较之学术研究的“纯粹理性”居于主导地位，以及教育学科基本属于“后发外生型”学科等因素的制约，教育学会的教育学术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学科性”不强、“本土化”不足的时代烙印。这些结论和观点虽有待进一步阐明与深化，但毕竟有助于学界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的基本面貌及其对教育学术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另外，由于中国近代教育学会始终肩负着组织和指导教育界人士开展教育改革运动及实践的时代重任并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迄今为止有关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探讨这方面的主题，致使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学会致力于推进教育学术的成果相对薄弱，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可谓弥补了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

本书作者曾在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育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中国教育史等课程，从而在教育学及教育史方面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2006—2011 年间他以在职研究生的身份入浙江大

学教育学院教育史学科攻读博士学位,进一步提高了中外教育史的学科素养。笔者作为其博士生导师,对他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深感喜悦,在本书即将付印之际写下上述文字,既有意向读者推荐中国近代教育史及教育学术史研究的这一新成果,也希望作者以此为新起点,不断探索,争取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肖 朗

2018 年元旦于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本序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C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1
一、选题缘起	1
二、概念界定	4
(一) 会、社; 社团; 学会	4
(二) 教育学会	6
(三) 教育学术	7
三、学术史检讨	9
四、研究思路与内容概要	16
第一章 教育学会的产生与发展	20
一、教育学会的产生	20
(一) 救亡图存与新式学会	21
(二) 新式教育与教育会社	26
(三) 学科体制与教育学会	32
二、教育学会的发展	37
(一) 清末时期的教育学会	38
(二) 北京政府时期的教育学会	41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学会	47
三、教育学会的数量、类型与宗旨	51
(一) 教育学会的数量	52
(二) 教育学会的类型	55
(三) 教育学会的宗旨	59



第二章 教育学会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平台的搭建	65
一、教育学会与教育学术研究的主体	66
(一) 教育学会与教育专业人员的汇集	66
(二) 教育学会与教育家群体力量的集成	71
二、教育学会与教育学术研究的方式	79
(一) 举行年会,集中研讨	80
(二) 编辑发行刊物,加强学术交流	89
(三) 设立专门机构,深化学术研究	98
(四) 组织学术讲演,扩大学术传播	108
(五) 参与世界教育会议,融入国际教育舞台	117
第三章 教育学会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嬗递	
——以综合性教育学会为考察对象	127
一、江苏省教育会与清末民初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启动	128
(一) 初露锋芒:江苏教育总会与“单级教授”制的导入、推广和研究	130
(二) 再接再厉:江苏省教育会与“理科”教授的研究	141
二、中华教育改进社与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转向	152
(一) “美国情结”与中华教育改进社	155
(二) 中华教育改进社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引介	160
(三) 中华教育改进社与美国教育家在华教育学术活动	165
(四) 美国教育学说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质变	170
三、中国教育学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深化	177
(一) 顺时应势:中国教育学会关于“中国教育改造”的反思	179
(二) 深度参与:中国教育学会关于“师资训练”“大学教育学系方针及设施”的研讨	187

四、小结	202
第四章 教育学会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拓展	
——以专门性教育学会为考察对象	206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研究	206
(一) 职业教育基本范畴的研究	208
(二) “职业指导”的研究	215
(三) 中华职业教育社与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学术	222
二、中国社会教育社与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研究	229
(一) “社会教育在学制系统上之地位”的研究	231
(二) “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的研究	238
(三) 中国社会教育社与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学术	246
三、中华儿童教育社与中国近代儿童教育研究	251
(一) “儿童中心教育”的研究	252
(二) “儿童健康教育”的研究	261
(三) 中华儿童教育社与近代中国儿童教育学术	267
四、小结	271
第五章 教育学会与近代政府、大学之间的关系	277
一、教育学会与政府:学术研究的限度与调适	277
(一) 学术研究:政府之于教育学会的“规范与制约”	278
(二) 社会参与:教育学会之于政府的“顺应与抗争”	283
(三) 教育救国:教育学会与政府之“合作与互动”	288
二、教育学会与大学:学术研究的互助与坚守	297
(一) 教育学会与大学之关系鸟瞰	298
(二) 散布:教育学会联络大学开展学术研究	302
(三) 聚合:大学借助教育学会传播与推广研究成果	307
(四) 教育学会与大学学术活动之“双赢”	314
三、在政府与大学之间	316



结语	320
一、教育学会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学科性”	321
二、教育学会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本土化”	324
参考文献	327
后记	335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教育学会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道亮丽风景,予以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驱动乃不争之事实。《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述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时即写道:“此种会议,虽无固定机关,但于吾国教育贡献甚大,尤以学制之改革由于该会促进者居多,未可忽视。”^①此类例证,不胜枚举。当时,学界人士与官方均意识到“教育会这个团体确实有益于教育事业”^②。不仅如此,在相互作用于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多股力量中,教育学会的影响甚至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诚如孙培青先生、董远骞先生在为张伟平著《教育会社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所作序中所言:“新学制和新教育立法的实施,主要是依靠民众组织,尤其是教育会社。教育会社的建立和它的积极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活动,是中

^① 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135页,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4。

^② 宋荐戈:《中华近世通鉴·教育学卷》,21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值得我们进行历史回顾,总结其经验与教训。”^①“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汇合的汹涌浪潮中,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向现代文化转换,教育是在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近代化发展中,转换得较为显著即高于成效的一个领域,而起主要作用的是教育会社,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②由此,将教育学会视作观察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一扇窗口也并非为过,研究教育学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

教育学会之所以能在近代中国教育变革中发挥如此作为,究其实质,就在于搭建起汇聚热心教育之士与教育专业人员研讨教育问题的平台,从而契合近代中国教育逐步驶上专门化轨道对于学术研究的急切呼唤,承载了清末以来士绅、绅商以及学人介入学务、实践“教育救国”理想的夙愿。清末学部所奏并获清廷允准的《各省教育会章程》说得颇为明白:“现学堂教育方见萌芽,深明教育理法之人殆不数觐,是非互相切劘、互相研究不足尽劝导之责,备顾问之选。”^③的确,当近代中国教育溢出政治与哲学的附属,成为相对独立的一项社会事业后,其进程中累积的问题,如教育方针的拟定、教育制度的设计、教育内容的取舍等,均不再凭借主观臆愿或已有经验乃至一纸政令、谕旨所能解决,须有系统化的理论指导方能成事。为此,汇集热心教育之士与教育专业人员,展开学术研究势在必行。《各省教育会章程》颁布前夕即已成立的江苏学务总会及其所奉“专事研究本省学务之得失,以图学界之进步,不涉学外事”^④宗旨,可以为之注脚。而主要源于“教育理法,极为博深;教育业务,又益繁重,非决一二执行教育之人所能尽其义蕴”,非“汇集教育名家开议教育事项”不可的清末中央教育会^⑤,以及效仿“欧美诸邦对于教育多取联络主义”之举,旨在“萃集全国教育家各执疑难,逐项剖析”与国计民生有“极为重

① 张伟平:《教育会社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孙序,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② 张伟平:《教育会社与中国教育近代化》,董序,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③ 朱有瓚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25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④ 《江苏学会暂定简章》,载《东方杂志》,1905(12)。

⑤ 朱有瓚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17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大”关系之教育事宜的民初全国教育会联合会^①等的组建,则进一步诠释着近代中国教育变革对于教育学会的期盼。换句话说,学术研究是教育学会影响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主要途径。因此,不论清末与民初政府部章,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会法》以及关于学术团体管理办法等规章,或是当时各级各类教育学会自身所定章程,均确认了教育学会研究教育学术或从事学术活动的旨趣,尽管学术研究的“纯粹理性”往往让位于教育救国的“实践理性”,但不能因此忽视教育学会的主旨。

就教育学会展开学术研究的方式而言,又不似中国古代几近“单兵作战”的传统格局,而是通过举行年会、编辑发行刊物、设置专门机构、开展学术讲演、参与国际教育交流等近代学会制度应有之举措,聚拢社会热心教育之士与教育专业人员,进而集成教育家群体之力深入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不仅为近代中国教育变革提供学理支撑,而且彰显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制度化走向。揆诸史实不难发现,在近代中国教育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如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等,几乎都有出入教育学会的经历,甚至直接担任发起者、组织者角色,在提升教育学会专业化程度的同时,亦以之为阵地,动员、吸纳、荟萃全国各地教育志士,联络国外教育名家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以教育学会为依托的热心教育之士与教育专业人员身先示范,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一方面,学术研究结果以提案、议案方式条陈、建议于官厅与教育行政机构,从政策层面加以贯彻推行,促成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另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的开展,更新教育观念,拓宽学术领域,推动教育理论与方法的进展,催生新的教育分支学科,充实、丰富近代中国教育学科体系。

总之,教育学会的兴起,表征着近代中国社会与教育变迁的新趋势。以学术研究为支点,教育学会积极介入近代中国教育变革之实践,为其宣传造势、摇旗呐喊,乃至直接主导近代中国教育的变革进程,且一定程度上协调政

^① 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20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府与社会在发展教育问题上的共识。与此同时,教育学会加速着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制度化,并借助制度化举措,将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推向纵深,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学科化发展。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史视角切入教育学会的研究,将更为客观地展现其历史面相,助益于深化和拓展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认知以及中国教育史、教育学科史的研究。

二、概念界定

(一) 会、社; 社团; 学会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集会结社传统,“会”“社”不仅贯穿于实践层面,而且呈现在概念、知识体系中,形成有着特定内涵与外延的范畴,虽然,从语源学的角度看,“会”与“社”的含义不尽相同。^① 近代以来的国人集会结社,尽管离不开传统浸润,但又并非其自然延续的结果。据有的研究人员考察,近代中国所谓“会”“社”,词源上,来自英语“association”一词,也称“社团”,其意“指二人或二人以上之结合,有其自定的规章和行政组织,也有共同的利益和特殊的目的;为达到其利益和目的,并有一定的活动程序”。另外,英语中还有与“association”词义近似的“group”(团体)一词。就起源而言,它们均“产生在商品经济交换关系基础上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社会中”,为“独立自主的人们的结合”,故异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按血缘、地缘关系联合”的传统会、社,其特点是:主义(宗旨、目标)的结合替代了情感的结合;组织原则、章程纪律的严密性替代了上下单一垂直性;人的自主性取代了人身依附性;开放性代替封闭性。^② 显然,近代会、社与古代会、社建筑在不同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基础上,有着相互区别的属性。

①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1~1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② 刘健清:《中华文化通志·社团志》,3~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